

13至14世纪“宗派之图”碑与北方汉人宗族的复兴

——以鲁中山地的军功家族为中心

周晓冀

(泰山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21)

摘要:金元之交,北方汉人宗族最先兴起于军功家族。他们利用“根脚”和“承荫”,在墓碑上刻写“宗派之图”,建立了同宗共祖的血缘组织。13至14世纪,“宗派之图”碑集中在鲁中山地出现,反映了北方汉人从祖先崇拜向宗族意识的过渡。汉人宗族在蒙元统治下争取权利,利用碑刻记录宗支世系和分派,表现出与南方地区不一样的谱牒类型和特点。元代适清,北方宗族组织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山东地区提供了可资证明的实例。

关键词:元代宗族;汉人世侯;军功家族;宗派之图;鲁中山地

中图分类号:K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7)01-0132-06

DOI:10.15899/j.cnki.1005-5681.2017.01.027

The “Figure of Sectarian” Steles and the Revival of Northern Chinese Lineage in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y

--Centered on Military Family in the Luzhong Mountainous Region

ZHOU Xiao-ji

Abstract:The turn of the Jin and Yuan Dynasty, the northern lineage arose in the military family. They depended on the preferential policies to established the consanguineous organization with the same common ancestor by carving the “figure of sectarian” on tombstones. In 13th and 14th century, “the figure of sectarian” steles appeared mainly in the Luzhong mountainous region, which reflects the ancestor worship of northern han developing into the lineage consciousness. The han lineage foughted for rights under the rule of the the Mongolian, and show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southern. They recorded their descents and branches on stone steles as the genealogy. From the Yuan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lineage had been continuous. This view is supported by substantial evidence found in Shandong area.

Key words: The Chinese Lineage in Qing Dynasty; Han Marquis; Military Family; Figure of Sectarian; Mountainous Region in Luzhong

安史之乱和唐末战争导致传统世族势力崩溃,五代之时华北地区已无大族可言。至北宋时期,由儒家推动的宗族复建活动陆续展开,出现了新型的官僚缙绅宗族。然而随着女真和蒙元的入侵,华北人口大量减损和迁移,血缘与地缘结合的社会结构趋于瓦解。金元之交,北方汉人军功家族开始兴起,并对明清以后的宗族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如果说,宋人主要进行的是宗族理论的探讨,那么元人则在实践上构筑了完整的新宗族形态。^[1]

元人的宗族实践主要体现在宗族组织的民间化和世俗化。不但出现了大宗祠和各种管理规范的族田,族谱形式和内容上也更加丰富,“谱图之法”成为元谱的定例,表达出对更远世系的追求。元代宗族的这些新变化起于金元之交北方的汉人世侯和军功家族,他们通过刻立“宗派之图”碑,强化了保存谱系的意识。尤其是这些军功家族通过有意识的世系

选择,形成了以父系原则为核心的宗族组织,实现了民间家族组织向宗族的自然转化。这些新兴的父系血缘团体,不但具有北宋以来宗族组织的一般特征,而且逐渐走上与南方地区宗族发展不同的道路。13世纪的鲁中山地,是蒙元、金和南宋以及红袄军和各种地方武装混战的区域,“宗派之图”碑集中出现于此有其历史必然性。

汉人世侯在面对民族与宗族问题上的对策以及他们的身份认同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关注。^[2]而探讨汉人世侯和军功家族在先茔碑上刻录谱系的社会意义,则刚刚处于起步阶段。较有代表性的成果除常建华《元代族谱研究》、魏峰《先茔碑记与元代家族组织》、王霞蔚博士论文《金元以降山西中东部地区的宗族与地方社会》等以外,还有日本学者饭山知保最近的专文讨论。^[3]饭山知保的文章提出几个重要观点,一是先茔碑为特在蒙元时期北方流行的一种世系碑刻,是新兴官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泰山地区佛教造像研究》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5YJA78001。

收稿日期:2016-10-09

作者简介:周晓冀(1971-),男,江苏宜兴人,泰山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助理研究员 博士,主要从事宗族社会史研究。

员第一次记录家族谱系的媒体。二是到13世纪末,平民家族也开始建立先茔碑,于是把系谱刻在先茔碑上成为北方地区的普遍现象。这些观点对本文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也有些观点需要对话和纠正。比如他认为蒙元时期北方人没有意识到苏洵与他们立碑之间的延续性,元明之后不再有建立先茔碑的事例,而且这种碑刻并没有促进大规模宗族组织的发展以及12世纪以前没有如先茔碑把系谱图刻在石头上的实例等。显然,材料的缺乏影响了其观点和判断。鲁中山地在金元之交出现的世系碑刻,不仅局限于先茔碑,还有墓志和神道碑等形制,形成了一种“宗派之图”的类型,谱文中的内容也有许多新的发现。本文即尝试以军功家族“宗派之图”碑的材料,来分析身处社会危机,华北地方宗族如何处理民族和家族、生存和发展的矛盾,又是如何在元代顺利实现身份转变,而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这些问题涉及到金元之交北方汉人的国家认同以及蒙元的民族观,值得认真加以考量。

一、宋金时期鲁中山地的宗族和谱牒形态

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二《郡望》条谈到,“五季之乱,谱牒散失。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1]宗族的重建和谱牒的创修都离不开儒学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推广,而鲁中山地在宋代正好具备了浓厚的儒学氛围。孙复、石介和胡瑗并称“宋初三先生”,他们设坛授徒,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以继承儒家道统自居。石介与孙复均与欧阳修交好,后者曾为二人作墓志铭。欧阳修是新式宗族和谱牒的倡导者,不但以“断自可见之世”为原则,创修了《欧阳氏谱图》,还将宗族世系刻在碑上。南宋欧阳守道曾记:“熙宁见六一公作世次碑。”^[2]北宋在碑上刻世系图的实例还可见《三晋石刻大全》,该书所录熙宁十年(1077年)《王氏世系碑》列有六代祖孙,世系图呈树形排列。^[3]该碑以曾祖为起点的世系,象征祭祀牌位的昭穆次序,实际上就是一通先茔碑。这个例子说明,在北宋刻石为谱并非空穴来风。徂徕石氏的宗族实践则更早,石介于康定二年(1041年)撰《石氏先茔墓表》,对曾祖以下宗支世系情况叙述详尽。后晋时期石氏分为五大院,之后大院又分十六小院,至石介时共有族人五十四,在宋初已成为一定规模的宗族。^[4]石介所做墓表意在尊祖而收族,“祀远,惟介之烈考能谈其谱,讨源及流,实为详尽。小子尝受之烈考,终不有识,大惧坠落。又为石高五尺,广二尺三寸,厚一尺,列辞二千三百六十八字,表于墓前,以传万世。”^[5]从文意上看,似乎是以文章谱的形式刻立的墓表,也算是一种石刻的谱牒。^[6]徂徕石氏一族是北宋比较典型的地主官僚宗族,尽管世系和规模都很有限,但在鲁中山地的宗族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

金朝统一黄淮地区之后,猛安谋克与汉人杂居,北方的社会经济与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政府括籍夺田,“悉祖与民”,使“农民重困”,^[7]汉人宗族的聚居形态遭到破坏。但是金世宗时期,由于推行与民休息政策,在山东招抚汉人归农,“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北方宗族又因此得到短暂的恢复,金大定年间各地出现了许多刻有谱系的石碑。其中有些是为汉人军功家族所立,他们最早成为有资格也有条件记录长世系的宗族。如泰安徂徕镇许家庄村的许氏,五代后期由河南许昌逃难而来,从三兄弟发展到十世五十余家。许氏之所以在战

乱之中能够保全宗族,除了徂徕山区闭塞的环境有利于藏身聚居之外,更赖其族人以军功获得庇护。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许氏刻立《许氏坟林宗族之记》碑^[8],记载立碑人许志、许彬等“破正阳首登城,以功累转昭信校尉,曾任解州商酒都监司”。碑文还谈及其族的谱牒情况,“自始祖而下尝有一图本,列次宗枝之名位,代代保之。然多以农桑为业,或进身于诗书,奋迹于武勇,荣膺轩冕者亦不鲜矣。□世远不可得而详言之,况计之片楮。又丁宋季之乱,干戈竞起,舍屋既焚,因以失去,莫复录实,谁其念之。”许氏宗族曾创简易的世系图本,但因宋金战争而毁于战火,世系的断裂和宗族的离散在所难免。因此碑文提出:“远祖之后图亡,既难推考,宜自目今十代孙列在碑阴,广空其下,庶使来裔世世得以叙之石,至无所容,仍冀后人别加措划,以谋长策。”能记十代子孙大概就是二三百年的,已能将世系上溯至五代时期的始迁祖,这无疑是一种标准的谱牒编纂方式,尤其是“广空其下”的做法更与“余庆录”之类相同。金代北方汉人宗族留下的族谱很少,而多选择将谱系刻在碑石上,这是与南宋地区宗族的重要区别之一。欧阳守道曾在《书欧阳氏族谱》中记载南方盛行纸质谱牒的情况,“前后所见同姓诸谱,但在庐陵诸邑已六七本,各巨帙细书。至临郡清江、宜春、长沙同姓,亦各有谱”。^[9]

总之,在宋金时期,北方汉人宗族的发展十分有限。特别是在金代,由于战争和民族政策的原因,多数汉人宗族在脱离原有的聚集形态之后,没能继续形成稳定和有力的血缘联系。战乱又导致谱牒大量被毁,祖先坟茔也因族人迁徙流散而遗忘。人们失去有关宗族历史和世系的记录,只好通过为祖先刻立先茔碑,以图保存仅有的世系记忆。因此在北方地区,墓祭成为主要的宗族活动,而军功家族则是这一宗族实践的代表。他们将“见在”的谱系刻在碑上,希望能在不可预见的后世保存得更为长久一些。这种世系碑刻遂成为元代“宗派之图”碑之滥觞。然而女真政府不相信汉人执掌地方,山东一地仅为刘豫短暂所领。金代的汉人军功家族比较少,更不可能形成地方割据势力,汉人宗族复兴的时机尚未成熟。

二、汉人军功家族的兴起与“宗派之图”碑的建立

13世纪以来,随着蒙古势力的不断南侵,北方社会的宗族发展再次陷入深刻危机。1214年,金宣宗被迫迁都南京(开封),不久黄河以北尽入蒙古囊中。北方汉族豪强陆续结兵自保,在女真、南宋和蒙古各个阵营间摇摆不定。出于对金作战的需要,蒙古在华北设立汉军万户,原来的金朝军功家族纷纷归服。其中势力较大的被封为万户,获得地方制辖权,准其世袭,史称“汉人世侯”。而依附于世侯的中下级军官,也允许其子孙世袭官职,参与南征,获得各种擢升和恩惠。由于金元之交军功家族大量出现,北方汉人宗族具备了复兴的条件和可能。这些军功家族并非是依靠现成的父系团体而兴起的,但是当他们在地方社会具备权威和地位以后,便开始尝试构建自己的血缘世系群。这种主动构建宗族的动机和思想就体现在“宗派之图”碑上。

“宗派之图”是以军功将领为核心的父系世系图表,新兴宗族将其刻在先茔碑上,起到明确血缘团体的范围,强化血缘联结的纽带,保证族人特权的作用。这是一种新的石刻类型,体现了元朝盛行的“根脚”和“蒙荫”风气。这种碑刻多为

先莹碑、墓志或神道碑,额题“宗派之图”或“祖宗之图”。其世系往往追溯至始迁之祖(某些圣贤世系碑更是上溯至孔孟诸贤),往下又及立碑者的子孙,因此形成多个分支派系的图谱。“宗派之图”碑实际上突破了欧苏谱“五世为图”的局限,合可考之族于一碑,是将大宗谱法的原则应用于小宗世系图的实践。这种碑刻形制高大、华丽,以蟠螭碑首和龟趺碑座为常见,并非一般士人所能制作。^④它们集中建立于13世纪后半期到14世纪,也正是蒙元政权逐渐稳定并控制全国的时期。元人的宗族实践正是从北方汉人宗族刻立“宗派之图”碑开始的。

“宗派之图”受北宋士人刻石为谱的影响^⑤,最早以世系图表的形式集中出现于金世宗时期的晋中南地区。现在已知最早的金代世系碑,是山西寿阳县《峪口吴家祖莹经幢》,刻于金大定十年(1170年),为六棱形。其第一、二、三面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文,第四面是墓志铭,第五面是家族世谱。世系图从高祖开始记起,从上往下排列了五代人的姓名。^⑥另外还有三通皆为金大定十一年(1171年)所立。其一为定襄县《故周公宗派图记》,记高祖以下三支子孙的世系,分刻四面。^⑦其二为闻喜县《裴氏相公家谱之碑》,序文中说“今欲将家谱模勒是碑,非徒为远近荣观,又且为不朽之计”。碑刻唐人裴滔所撰三卷(支)谱系,体例为文章谱。其三是绛县《西董氏家谱之记》碑,碑阳镌“董氏宗谱图”,记录了八代世系。同年所立《董父崇龙碑》铭曰:“家风好事,人物多贤,谱记镌石,永显其传。”^⑧前者即已出现“宗派”两字,从题名上看明显是一

通刻有家族分支谱系的先莹碑。后两者处于晋南地区,是早期将族谱刻碑的典型例子。金熙宗、世宗都推崇儒教,重视孔孟后人的寻访和世系的确认,并将孟子的祭祀地位提高到国家高度,于是在金代形成了所谓孔孟“圣裔”制度。作为方便记录家族历史和世系的“宗派之图”,也从晋南传播至山东。今存邹县孟庙的《重修邹国公庙记》碑,就是当地较早接受这一风气的例子。该碑刻于金代大安三年(1211年)六月,由知泰定军节度副使赵伯成撰文,宣威将军、前行滕州邹县令王瑁立石。该碑碑阴额题“邹国公累世孙之派”,世系为横格制表,从右至左,顺次记叙孟子四十四代至四十九代子孙世系和所居村落。该碑列世系人名27行,各种施主姓名里籍26行,并说“四十三世已(以)上世系载在家谱”。这是一种多种文体混杂的世系碑刻,说明当时的“宗派之图”碑还尚未定型。

元朝建立以后,蒙古统治者继续推行尊崇孔孟礼教的政策,尤其注重山东地区孔孟世系的重建和恢复。元朝仿照宋金对孔孟圣贤后代的任命和恩荫制度,在孔庙和孟庙刻立了数通世系碑,同时孔孟直系后代的墓碑也多刻录家族世系,以示正本清源。孔庙和孟庙圣贤世系碑的集中出现,代表着“宗派之图”样式在邹鲁之地正式确立起来。以天顺元年(1328年)山东淮南等路行省勘立的《先师亚圣邹国公续世系图记》碑为例,碑阴的“亚圣宗派之图”记载了孟宁之下八世世系。世系图为垂珠式,世代之间以直线相联,纵线为父子祖孙关系,横线为兄弟旁系关系。还有至顺二年(1331年)所刻《皇帝圣旨里》碑,碑阴为“孟氏宗支图派”。碑体自上半部分

表1 《金石汇目分编》所见元代谱碑(碑名依原著)

序号	碑名	碑阴	建碑时间	地点
1	元权袭封主奉祀孔肅墓记	分派图	皇庆元年	曲阜
2	元孔子五十三世孙奉议大夫孔澄墓碣	宗派图	至正四年	曲阜
3	元孔子五十四世孙奉议大夫孔思逮墓碑	宗派图	至正十六年	曲阜
4	元孔子五十四世孙参政知事孔口口墓碑	宗派图	至正十六年	曲阜
5	元胡氏先莹记	世系图	至元三十年	宁阳
6	元孙氏墓记	宗派图	至元三十一年	宁阳
7	元邹国公续世系图记	世系图	天顺元年	邹县
8	元杨氏先莹记	宗支图	延佑四年	邹县
9	元董君墓碑	世系图	泰定四年	邹县
10	元朱氏先莹记	世系图	泰定四年	邹县
11	元张谅墓碑本宗图	本宗图	至正十三年	邹县
12	元任城赵君墓碣铭	宗支图	至治二年	济宁
13	元武斌墓碑	宗族图	至元二年	嘉祥
14	元杨氏祖莹碑	世系图	至正十二年	嘉祥
15	元杨氏祖莹记	宗派图	至大三年	嘉祥
16	元邵信墓碑	宗派图	天历元年	嘉祥
17	元唐氏世系图	宗派图	至元六年	嘉祥
18	元日照县令相林墓碑	宗派图	至正三年	日照

刻有孔氏第三代至四十四代子孙姓名,下半部分刻有四十五代孟宁至五十五代世系图。碑文为延佑元年(1314年)中书省所下为孟氏子孙勒田免税的官文,落款是“山东宣慰使司”。

立“宗派之图”碑由政府授意,官员参与,属于合法的宗族行为。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在统一战争中涌现出大量军功家族的鲁中山地,开始流行利用墓碑记录世系和房派。肥城石横镇大德二年(1298年)《故都统刘公墓志铭》,碑阴为“宗派之图”。新泰羊流镇至治三年(1323年)《太守徐公神道之碑》,碑阴亦为“宗派之图”。章丘普集镇泰定三年(1326年)《大朝故元帅李公神道碑》,额题“宗派之图”下刻有十世支系图。民国《重修泰安县志》著录数通元代先茔碑,其中延佑七年(1320年)《千户平公祖茔》碑,碑阴刻“祖宗之图”,也是典型的军功家族碑刻。另一延佑年间的《临汶公氏祖茔碑》,碑阴亦为“宗系之图”,叙述始祖公全所生四子派下世系。^[12]元朝统一全国后,建立先茔碑刻成为奖掖汉人世侯和军功家族的手段。如果说孔孟圣贤之族是被动地由统治者扶持起来的,那么元代的军功家族则是依靠自己力量,通过获得官职和名望而复兴的。

金元之交,“宗派之图”成为军功家族记录宗派世系的主要手段,在北方地区普遍流行起来。而到了13世纪末期,庶民之族也开始在墓碑上刻录世系图。清人吴式芬所著《金石汇目分编》中,记载了18通元代世系碑。除了因蒙元政权特意寻访和扶植的孔氏和孟氏,其余建碑者的身份尚不清楚,但无疑均是皇族、世族以外的庶民。这些碑刻主要分布今鲁中山地的西南部(见表1)。

元代较早的“宗派之图”碑集中出现于鲁中山地的西部地区,而且靠近“孔孟之乡”的曲阜和邹县。这里毗邻鲁中的泰安、肥城和新泰等地,中间有宽阔的河谷平原地带,交通便利,是山东地区最具特色的宗族文化地带。2000年来儒家文化在两地之间相互流传而光大,其中较为著名的例证如以汉代“孝文化”著称的肥城“郭巨墓”^①,西汉今文礼学最早传授者平阳高堂生(今山东新泰龙廷人),宋代迄清出现泰山儒学“五贤”即孙复、石介、胡瑗和宋熹、赵国麟以及“名士”党怀英、王去非兄弟等人。这一地区在元明时期出现大量反映儒学宗族实践的碑刻,有其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图1 元代山东中西部部分府县设置



三、《刘海墓志铭》所反映的蒙元统一战争与宗族发展

《刘海墓志铭》,大德二年(1298年)刻,额题“故都统刘公

墓志铭”。所在地原属肥城前衡鱼村,今属平阴县邱林村,两村今毗邻。^②该碑高约5米,宽0.8米,厚0.4米,形制恢弘大气。碑首高浮雕螭龙戏珠,刻画精细,间饰云纹。碑阳书墓志铭文,碑阴为“宗派之图”。

图2 《刘海墓志铭》碑阴额题“宗派之图”



墓志铭由“奉训大夫孟州知州前集贤待制杨遇撰并篆额”,“承事郎前济宁路肥城县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兼劝农事段继祖书丹”。因碑身半没土中,志文多有缺失。幸坊间流传有拓片^[13],碑文亦被选入《济南历代墓志铭》^[14]。

刘海墓在光绪十七年《肥城县志》和光绪三十四年《肥城县乡土志》古迹中皆由著录,但讹为“刘海东”。刘海事迹于史无征,但志文中所及人物和战事都有历史根据。刘海出身地方官僚家庭,金元之交家族败落,遂依附于“严无惠公”。严无惠公即严实,东平路行军万户,是山东地区最大的汉人世侯。汉人世侯有属地官员任免权,于是“辟复(刘海)为平阴都统”。刘海“召集流移”,“以部民从役”,在参加开封近郊黄龙岗之战中陷歿。^③一个中下层小军官战死沙场,本是蒙元战争中寻常之事。然而后世子孙却为其刻立了如此高规格的墓志,不能不让人对元朝的职官制度、对待汉人的政策以及汉人军功家族入元后的心态做一番深思。

《元史·刑法志》记载元代禁令,“诸职官居见任,虽有善政,不许立碑,已立而犯赃污者毁之,无治状以虚誉立碑者毁之”。^[15]并禁止汉人官员服龙凤文及鞍鞞画云龙。织物上也不允许造“周身大龙”。规定“谓龙,五爪二角者”,一般将相、亲王或有功之臣的莽袍只能为四爪之蟒。刘海墓志碑首有四条螭,周覆云纹,显示出较高的社会地位。据当地文物工作者说,70年代附近还曾出土过石象生和龟趺。元人系仰仗汉人武装势力代其征伐的,故会给有军功的宗族以无上的荣誉,尤其刘海及其子孙均在此范围。因此,元朝的禁碑令也许对军功家族网开一面。

成吉思汗在消灭金军北方精锐后,命大将木华黎率偏师对付金朝,自己则全力西征中亚细亚。严实就是在这一时期归顺蒙古,成为攻灭金朝的主力。而刘海无疑是认可严实的身份转换,从而依附于他,成为汉人世侯阶层中的一员。尽管刘海职务不高,但是依当时的情形仍属于仕途可望之辈。蒙元选用官员重用军功,“根脚”的政治原则在地方社会同样适用。而且归附蒙元既可以“保障乡里”又能致身荣显,对原金朝境内的汉人十分具有吸引力。黄淮以北自建炎南渡,在女真的统治之下已有100余年。当地出生的汉人已有三四代之多,他们早已将自己视为异于南宋属民的“北人”。当蒙古南

下之时,严实之类民自保,在各种势力之中周旋。更多的人就像刘海一样,“天下板荡,无所依附”。而“贞祐之乱”造成山东地区“群盗并起”,百姓苦不堪言,鲁中山地成为各种势力混战的场所。正如刘海墓志中所说,“时河朔被扰,俚值凶荒,民有饥色”。对于刘海来说,追随严实就是明珠投暗;对于惊慌失措的流民来讲,投奔强势的蒙元才最有活命的机会。于是刘海一呼百应,组成了一支流民部队为蒙元在黄龙岗阻击金军。而刘海也正是在此役中“殁于王事”。后来,刘海的长子刘源“以将家子,例占军籍”,刚开始只是担任守把、百夫长等下层军职。丁巳年(1257年)蒙哥率大军征伐南宋,刘源从属严实,参加了鄂州之围。到至元庚辰年(1280年),累官至昭信校尉、后卫亲军都指挥使、司镇抚,佩金符。癸巳年(1293年)其子刘淙袭昭信校尉亲军千户,刘源荣归故里。大德丁酉年(1297年),刘源招淙商议为刘海立碑事。志文说,“命淙持行状诣京师,乞予以志公墓而铭之,兼议可否”。立碑之事不同寻常,应是在朝廷的允许下,才制作出如此体量巨大的碑刻。

刘海墓志碑是由其子孙树立起来的,之所以如此,是因其本人更是由于其子孙的关系。这也反映出元朝政府自罢汉人世侯权利之后,仍然给予原来以军功发迹的家族以恩惠奖掖。刘海后裔同样以军功获得社会地位,因而为其刻立墓志铭以示纪念和歌颂,更重要的是将“宗派之图”刻在碑上,使子孙后代都能受到祖先功德的荫庇。“宗派之图”实际上就是将刘海家族中具有直系血缘关系的亲属,置于官方划定的荫庇范围,相当于一份官方认定的世系档案。这种经过父系原则筛选的结果,则是形成了以刘海先祖为顶点的宗族组织。

四、“根脚”与“承荫”是元代宗族发展的动因

蒙元社会论“根脚”,讲“承荫”,不但高层蒙古、色目人如此,地方上的汉人世侯同样按照这一原则进仕和承袭官职。与科举出身的仕宦人物相比,有“根脚”者更为一帆风顺,其宗族也更有地位。^[16]当时的汉人世侯大小数以百计,在地方上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权利网络。

依附于蒙元的汉人宗族,为承袭父辈官职,树立地方威望,致力于在坟碑上刻录“宗派之图”,叙述祖先来历和功业。除上述肥城刘海墓碑外,今存还有新泰羊流镇徐家庄《太守徐公神道之碑》,刻于元至治三年(1323年)。该碑亦为螭龙碑首,螭座。《山左金石志》记,“亳州知州徐琛墓碑,至治三年三月立,正书。碑高五尺二寸,广三尺一寸。在新泰县和庄南徐公墓。右碑篆额未拓,文三十六行,字径六分。卫融撰并篆额,□(李)鉴书丹”。^[17]徐琛生于金正大七年(1230年),青年时“仪观魁伟,有杰士风”。^[18]宪宗五年为严忠济(严实长子)招为部下,己未(1259年)随军南征鄂州,任尚书行军万户府令史。至元三年(1266年)转任沂郯万户府经历,后升承直郎、广德路总管府判。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朝京师,拜奉直大夫、归德府亳州知州;元贞二年(1296年)敕封为中宪大夫,升归德府总管提督太守。后受丞相脱脱推荐南征,任三路副元帅。大德七年(1302年)卒于徐庄故里,享年七十三岁。元帝赠光禄大夫,赐御葬。其子徐彬为之立碑颂德,在碑阴刻“宗派之图”,并建碑亭以覆。“宗派之图”为纵列的线型世系图,姓名之下标注娶妻情况、子嗣数量和长次位置,而且从中可以辨别出有较为规范的辈分字。徐彬为徐琛四子,也蒙荫授官,

“彬字雅儒,荫黄州路麻城县尉”。^[19]徐琛墓园神道长50米,宽6米。神道中立一石坊,上书“徐公祖莹之门”。墓前翁仲、华表、石虎、石羊各二。如此高规格的墓园设计说明,徐琛宗族在元代地位显赫,财力雄厚,当为一方望族。

肥城孙伯镇庄头村武氏也是以军功起家。武元,从伯颜、阿术南征,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浩授宣武将军、领军都镇抚。弟武全从兄征战,亦授武信骑尉。族弟武进至元年间敕授承信校尉管军千户成都镇抚。武进之子国贞,袭父原官。后元代大德五年(1301年)为征西副元帅,擢显武将军。之后武家代出将军之职,计有武略将军、怀远将军、昭武将军以及河南副元帅等职务。武家为元朝统一江南地区,远征交趾,平定西南诸藩出力甚多,展现出汉人世侯以军功发迹的时代特征。《武氏族谱》记,“始祖雨畦公以下六世,备书于三世祖浩源公墓表之阴,盖我世祖君光公所敬识也”。^[20]浩源即武进(字君光)之父,至元时曾敕封承信校尉,大德年间因子功浩封显武将军。其墓表应为武进及子国贞所刻立,碑阴“宗派之图”,同样体现元代“承荫”制度的传统。不仅军功卓越者的子孙可以顺次承袭其官位,而且其父亲和祖上也能分别得到朝廷封赠。最初是国贞(袭父原职承信校尉管军千户成都镇抚),而后大德时武进“以子国贞功晋封显武将军”。同时武进之父也被浩封显武将军,已经去世的祖父武安和曾祖武圆则分别被浩赠为武义将军。这样,因武国贞在大德五年所授显武将军,其父祖和曾祖、高祖均被封赠将军一职。

“根脚”与“承荫”还表现为军功家族子弟参与征战,有更多的机会提升官职。延祐二年(1315年),国贞子武祥出镇云南;泰定二年(1325年)平赵丑厮、郭菩萨动乱,授武略将军、河南副元帅。国贞孙士英,至正初年(1341年)季阳翼指挥使、授怀远将军。曾孙武净,官至枢密院同知,浩授昭武将军。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配合察罕帖木儿和扩廓帖木儿父子收复东平和济宁。二十二年(1362年),兵围益都,受田丰、王仁成偷袭战死。武氏一门在元代浩授将军七位,校尉一位,父祖皆授封赠,遂成为地方大族。

五、结语

金元之交,北方地区社会动荡,汉人军功家族借助蒙元势力迅速发展起来。而蒙元也利用汉人世侯的地方武装,将其作为主力进攻金朝和南宋。元朝的荫叙制度初定于至元四年(1268年),“诸官品正从分等,职官用荫,各止一人”。这一政策使汉人世侯的家族势力得以巩固和扩大。

蒙古国后期,汉人世侯隐匿人户,“奴视所部”,严重扰乱地方社会秩序,成为社会经济恢复和历史发展的阻碍。^[21]燕京等处行尚书省设置以后,忽必烈实行“画境之制”,对地方行政区进行调整,开始逐步削弱汉人世侯的权力。入元以后,元朝继续推行蒙古至上的原则,使汉人和南人处于不利地位。随着元朝对中国全境的统一,汉人获得军功的机会大为减少。大德年间突然增多的“宗派之图”碑,就是汉人世侯争取权利,扩大家族影响的努力。

从碑文旨意来看,汉人世侯在宋金元三者交锋中,认可自己的北人身份,试图通过为蒙元征战获得相应的地位和权利。这种心理既有屈服于蒙元武力征服的因素,也是北方地区长期被金朝统治,与传统的汉人世界隔阂的结果。北方的汉人经过长期多民族的融合,风俗习惯和文化制度已经表现

出与南宋地区不一样的特点。加之金元时期,庙制不立,北方宗族的发展不受礼制束缚。13至14世纪,北方仿效和比肩圣贤家族的风气深入民间,所以“宗派之图”犹受地方宗族的推崇。

“宗派之图”碑出现的意义在于,首先代表了北方宗族在元代的复兴。先茔碑是汉人从祖先崇拜向宗族意识过渡的产物。这种新型的碑刻谱牒将宋儒划定的小宗世系进一步向五服之外的族人扩展,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苏洵所期待的大宗理想。宗族成为实际的生活团体不仅有了理论上的基础,而且确定了具体的世系范围。原先断续的父系世系经过“宗派之图”的整合,变成连续性的谱系,使民间祭祀五代甚至以上世系的祖先成为可能。其次,宗族组织从儒学的理想状态转化为现实的民间团体,山东地区提供了可资证明的实例,从而弥补了近世宗族从宋代发展到明清时期成熟的社会组织之间的重要缺环。可以认为,至少在鲁中山地金元之交就已经出现宗族庶民化倾向,民间祭祀远祖已经不是个案。同时,前述新泰徐琛和肥城武氏宗族,在明清时期都有较大规模的发展,证明元代以来北方宗族组织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再次,军功家族属于地方上的豪强,但是根基还是在民间社会。他们的出身并非世家大族,有的甚至只是江湖人士。他们的宗族意识是在拥有一定社会地位之后才产生,无论是专注于祖茔墓祭还是刻石为谱,都与士大夫阶层所强调的谱学传宗思想有出入。他们所刻的“宗派之图”是一种朴素的系谱传承方式,既有当地碑刻文化的传统影响,又有鲜明的世俗化特征。也就是说,为了世代获得朝廷蒙恩,军功家族必须收窄世系范围,通过父系原则的亲属筛选,构建直系血缘组织。这一点与孔孟圣贤之族如出一辙,而并非是宋代理学推动的结果。因此,北方家族组织向宗族的转化也是一个功能化的过程。金元时期,北方宗族发展出现一些与南方地区迥异的新特点、新模式,应该成为今后中国宗族史研究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

注释:

①相关研究可见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符海朝:《元代汉人世侯群体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章毅:《元代徽州路的军功家族》,《安徽史学》,2015年第3期;赵文坦:《汉人世侯与蒙元关系的演变——以世侯征伐镇戍为中心》,《文史哲》,2010年第2期;《金元之际汉人世侯的兴起与政治动向》,《南开学报》,2000年第6期。

②常建华先生也认为石氏墓表实际上是石谱。见氏作《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③此碑于1995年春被毁,见《中华泰山网》,http://www.my0538.com/2010/1020/31884.shtml。

④(明)胡侍《真珠船·坟碑之制》说,“(金石例)三品以上神道碑,五品以下不铭碑,谓之墓碣”。

⑤这种影响的确存在,如元至大元年《师氏族谱记》刻“族谱图表”,碑中专门提及,“昔庐陵欧公、眉山苏公,亦尝碑谱于莹域矣”。见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井陘县栉庄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第72页。

⑥该碑序文与《裴氏相公家谱之碑》文作者同为“彭城刘若虚”,篆额并书也是“西河靳愿”。

⑦经今人研究,世传“郭巨墓”实为汉代某郭氏大族之

墓,与“孝子”并无关系,但北朝以来当地一直流传此类传说,可以证明儒家“孝文化”之昌盛。

⑧1948年春由肥城七区衡渔村划出邱林村,归平阴县。

⑨应为黄陵岗,1233年。《元史》中“张柔传”、“史天泽传”、“速不台传”均有述。

参考文献:

[1] 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64.

[2][日]饭山知保.金元时期北方社会演变与“先茔碑”出现的意义[A]/第十四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论文集[C].山西大学,2012:682-694.

[3](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Z].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228.

[4](南宋)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十一,黄师董族谱序[Z].文渊阁四库全书二十七卷本.

[5] 刘泽民,王琳玉.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榆次区卷[Z].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24.

[6](民国)葛延瑛,吴元录.重修泰安县志,卷一四,艺文志·金石[Z].泰安县志局.民国18年(1929年)铅印本.

[7](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九,拜扫堂记[Z].北京:中华书局,1984:235.

[8](元)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十八,嘉议大夫陕西东路转运使刚敏王公神道碑铭[Z].

[9](南宋)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十九,书欧阳氏族谱[Z].文渊阁四库全书二十七卷本.

[10] 王霞蔚.金元以降山西中东部地区的宗族与地方社会[D].南开大学,2010.

[11] 牛诚修.定襄金石考,卷一[Z].雷华馆铅印本,1932:44.

[12](民国)葛延瑛,吴元录.重修泰安县志,卷六,艺文志·金石[Z].泰安县志局民国十八年(1929年)铅印本.

[13] 王庆吉,韩吉庚.石横镇志,人物传略·刘海东[Z].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47.

[14] 韩明祥.济南历代墓志铭,刘海东墓志铭[Z].济南:黄河出版社,2002:88.

[15] 元史,卷一百五,志五十三,刑法四,禁令[Z].北京:中华书局,2013:1781.

[16] 姚继荣.略论元朝仕进制度中的民族歧视政策[J].青海社会科学,1996,(3).

[17](清)毕沅.山左金石志,卷第二十二,元石[Z].

[18](清)江乾达.新泰县志,卷十八[Z].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刻本.

[19]新泰羊流镇徐家庄.平阳徐氏族谱[Z].徐有尚:元太守中宪大夫后赠光禄大夫徐公状记,顺治十一年(1854年)刻本.

[20]肥城孙伯镇庄头村.武氏族谱[Z].光绪十八年(1892年)刻本.

[21]赵文坦.蒙古国汉人世侯辖区社会经济考察[A]/蒙古史研究(第六辑)[C].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张 科]

[责任校对 胡成霞]